

中国公共危机

传播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2000—2013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A Study on the Role of News Media
in Public Crisis in China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媒体体制的改革作为这个宏大的项目的组成部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三十年前“命令型”传播体制为参照，作为媒介主体性的属性——公共性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具体表现为公共危机传播从无到有，媒介角色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了由政府喉舌到社会公器角色的渐近性量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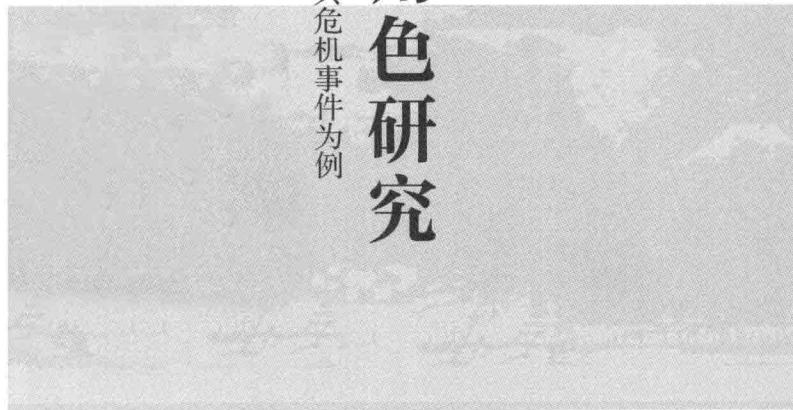
周 榕 著

中国公共危机

传播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以2000—2013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周榕 著



A Study on the Role of News Media
in Public Crisis in China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及反思性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揭示和阐明了我国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重要功能和角色价值,同时剖析了其现存矛盾和困境产生的原因,为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实现其应然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是研究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角色扮演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本书适合从事公共危机研究的高校教师、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及危机管理人员、企业的危机公关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研究——以 2000—2013 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周榕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80-0070-3

I . ①中… II . ①周… III . ①突发事件-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0208 号

中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以 2000—2013 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周 榕 著

策划编辑：杨 玲

责任编辑：封力煊

装帧设计：范翠璇

责任校对：曾 婷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75 插页：2

字 数：226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新闻传播实践呈现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景象,作为积极回应现实的学科,新闻传播学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反过来也成为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新动力。

在全国众多的新闻传播院系中,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传播教育富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与研究特色。

从办学特色看,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把自身打造成新闻教育的基地和体育记者的摇篮。从2001年开始,新闻传播学院先后开办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等本科专业,2013年获批成为湖北省省级试点学院,这也是全省新闻传播类唯一的试点学院。2014年,由新闻传播学院牵头,联合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三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与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建省级实习实训示范基地。

从研究特色看,新闻传播学院坚持新闻传播学与体育学融合研究,探索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前沿问题。为此,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媒体体育研究中心这一校级科研平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科研型的体育节目数字处理实验室。2012年10月,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获批省级重点培育学科,从而迎来了学科建设发展的新契机。2014年,张德胜教授牵头申报的“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获批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

学科建设是龙头,专业建设是基础,团队建设是关键。“抢机遇,入主流,创特色,出精品”,这已成为武体新闻传播人的基本共识。本丛书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从科研方面彰显出2013年度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建设的成果。

“新闻传播学重点学科建设丛书”第一批书目收录了五本专著,包括:张德胜教授的《媒体体育与体育媒体》,万晓红教授的《奥运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以柏林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为样本》,付晓静博士的《1990年代以来媒介体育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姚洪磊博士的《纪录片审美经验现象学》以及周榕博士的《中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研究——以2000—2013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这些著作既有对体育传播现象的深入考察与理论透视,也有对新闻传播学新鲜话题的深入解析与回应;既涉及宏观的理论问题,又涵盖了微观的实践分析。这五本著作,理论视角多元,研究思路丰富,关注问题深入,都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与沉淀,经过不断的修改与补充后得以问世的。

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在科研能力提升上进入了快车道,对于新闻传播学院师资水平,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展现。从体育传播学研究来看,本套丛书中的前三部,集中体现了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对于体育传播学前沿问题的关切,展现出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在体育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水准与研究实力。而姚洪磊博士与周榕博士,均是近年来学院引进的新闻传播学博士,他们都有着较长时间的新闻从业经历,再加之博士期间系统的学术训练,使他们的著作鲜明地体现了理论考察与实践体悟的结合。

“新闻传播学重点学科建设丛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湖北省教育厅与武汉体育学院对于新闻传播学重点学科建设的资助,其次还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关心与支持。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问世,能从不同视角丰富现有新闻传播学与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回应,从而进一步推动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的发展。

这五部著作的问世,只是新闻传播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的起点,不是终点。

张德胜
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东湖学者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序

这是一个危机环伺的时代，“在危机中”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调性。当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嵌入”全球风险社会^①的国际背景中，公共危机成为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常态。

同时，这是一个媒体逻辑的时代，媒体报道塑造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在公共危机发生时尤其如此。许多学者认为传播是影响危机处理成败的关键，因而传播占据着危机管理领域的极重要地位。^②

新闻媒介作为危机传播中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属于物质范畴，有着其独特的职能，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但因为权力与资本力量的牵引，它的独立性往往受到侵蚀。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媒介角色”而不用“媒介功能”，实际上承认了媒介行为的复杂性、丰富性，赋予了其人的特点。

角色理论以角色期待与个体主观能力的对接来分析和建构角色，用角色理论来研究系统中个体的作用，以及分析制约作用产生的因素，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公共危机传播是由媒介、政府和公众三要素构成的信息系统，本书用角色理论来研究新闻媒介在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系统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且分析影响其功能和责任承担的相关因素，主要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的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第二，我国的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实际扮演着什么角色，取得了什么进展，还存在着哪些困境，困境来源于何处？第三，通过哪些路径来解决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实然角色与应然角色之间差距，实现媒体角色的重构？对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多是基于个案的现象分析，止步于功能性的表层描述，缺少规律的探寻、性质的分析以及严谨的理论支撑。

本书重视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创新和发展的具体情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学角色理论，提出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演进性质

^① 1986年，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在德文版的《风险社会：向新现代性迈进》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将风险作为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后在其著作《世界风险社会》中提出“全球风险社会”，意指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作用下，世界进入一个与传统风险社会不同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的风险具有全球性、复杂性和关联性的特点。

^② 吴宜蓁. 危机传播[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9.



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近性量变。并且,突破了以往媒介角色冲突研究中单一的个案研究取向,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探讨和总结了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冲突的具体规律。在此基础上,把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新闻媒介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研究,剖析其现存矛盾和困境产生的原因,为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扮演应有的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第一章交代了研究目的、意义、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主要引鉴社会学的角色分析理论,描述角色论中的角色建构逻辑,进而以此为依据,建构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应然角色:危机前的预警者角色;危机中的沟通者、动员者和监督者角色;危机后的形象塑造者和反思者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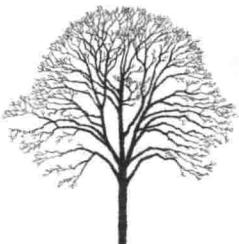
第三章将我国公共危机传播分为启蒙、觉醒和深化三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媒体角色的创新和发展。但这种对角色演进的梳理是反思性的,在梳理进展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演进的性质是政府主导下的媒介角色量变,是媒介作为政府喉舌角色基础上的角色丰富,这种性质的演进和发展带有先天局限性,那就是角色的演进和创新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会随政府的利益和意志或持续,或后退。最后,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演进的原因。

第四章分析了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实际上具有的三种角色身份,即政府喉舌角色、市场主体角色以及社会公器角色。这三种角色身份由于承载着不同的角色期待,因此引发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冲突,并且将媒体的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相对照,通过定量的分析,系统地研究冲突的具体表现,试图从中探寻出规律性的倾向;最后,指出了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冲突形成的原因。

第五章依据第四章对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冲突困境发生的原因分析,分别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层面,提出对媒体实然角色进行重构,实现其应然角色的路径。

作 者
2014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3

一、研究背景/3

二、研究意义/5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6

一、公共危机传播的研究综述/6

二、媒介角色的研究综述/11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15

一、公共危机/15

二、公共危机传播/18

三、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与公众/20

四、媒介角色/22

第四节 研究架构和方法/23

一、研究思路/23

二、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25

三、研究的创新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26

第二章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应然角色建构/29

第一节 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和媒介角色的建构逻辑/31

一、社会学中的“角色”概念/31

二、角色论的理论框架/38



三、角色理论用于媒介研究的合理性分析 / 42

四、基于角色理论的媒介角色建构逻辑 / 43

第二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应然角色的建构 / 47

一、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应然角色建构的价值标准 / 47

二、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应然角色 / 49

第三章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演进 / 59

第一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演进的历程 / 62

一、公共危机传播启蒙期(2000—2002 年)的媒介角色:记录者和监督者 / 64

二、公共危机传播觉醒期(2003—2007 年)的媒介角色:沟通者、反思者和预警者 / 71

三、公共危机传播深化期(2008 年—至今)的媒介角色:社会动员者和国家形象塑造者 / 81

第二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演进的性质和逻辑 / 93

一、媒介角色演进的性质 / 93

二、媒介角色演进的逻辑 / 96

第三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演进的影响因素 / 99

一、环境因素 / 100

二、文化因素 / 107

三、媒体因素 / 109

第四章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冲突 / 113

第一节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身份 / 115

一、政府喉舌角色 / 116

二、市场主体角色 / 117

三、社会公器角色 / 118

第二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冲突现状 / 119

一、政府喉舌角色与社会公器角色之间的冲突 / 120

二、市场主体角色与社会公器角色之间的冲突 / 134

三、政府喉舌角色与市场主体角色之间的冲突 / 141

第三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冲突原因 / 144

一、政府因素 / 144

二、市场因素 / 149

三、公众因素/152

第五章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重构路径/155

第一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重构的政府路径/157

一、形成以实现媒介公共性为导向的媒介体制改革目标/157

二、建立实现媒介主体性的配套机制/158

三、制定保障和规范媒介公共危机报道的政策法规/160

第二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重构的媒体路径/161

一、形成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导向的角色意识/162

二、建立行业内的自律和公众监督机制/163

三、制定公共危机报道的相关准则/164

第三节 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重构的公众路径/166

一、培养公众的权利意识/166

二、完善公众的媒介素养/167

结语/169

参考文献/171

后记/17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风险社会”^①和我国社会转型的双重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进入不和谐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事件。危机事件的不断发生、不断升级演变及其对社会问题的放大性特征,为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贝克认为:追求利润是现代社会的首要目的,人类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但这种成果却是通过毁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取得的。当这种破坏积累到临界点,人类社会就站在了自己制造的“文明火山”之巅,迎来了危机环伺的风险社会。

贝克还将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联系到一起,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风险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全球性的,并且风险强度显著增强,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打破了传统社会里风险的分配逻辑,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幸免于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危险。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人们可能因为经济状况的不同,富人有更多规避风险的手段,但在风险社会里,没有人是风险的旁观者;二是风险环境在世界各处扩散,若要解决风险带来的危机,需要跨越国界,即在全球范围内应对。

贝克将风险社会的研究聚焦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在贝克看来,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渐进发展不同,中国的发展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西方国家在几百年时间内完成的现代化历程,这使得中国不仅面临天灾等传统社会的风险,还要面对现代社会诸如无理性的过度发展造成的生态风险等多种现代社会风险,并且本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交织丛生。^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与其有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在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多种风险的同时,中国本身由总体社会向分

^① 1986年,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将风险作为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后在其著作《世界风险社会》中提出“全球风险社会”,意指在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作用下,世界进入一个与传统风险社会不同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的风险具有全球性、复杂性和关联性的特点。

^② 乌尔里奇·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



化性社会过渡的结构、所处的走向多极化世界的历史阶段，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为各种风险提供了放大的可能性。

目前，中国式风险更多地源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失衡和断裂。中国社会转型源自于 1978 年至今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转型包含着社会形态的变迁与社会结构调整双重意义，并且深入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领域。从体制上中国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社会结构由国家与社会一体的总体社会向国家、社会分离的分化社会转换；整个社会的发展由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

这种“大跃进”式地高度浓缩的转型造成了社会结构的脆弱，在多层次的格局转换中，旧的机制逐渐瓦解，但新的体系与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诱发了各种风险，加大了危机形成的概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用“断裂社会”^①来概括处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突飞猛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同迟滞的生产观念、制度之间的距离；日新月异的生活内容和落后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之间的矛盾；不断膨胀的物质生活与健康的生活理念的错位等各方面的失衡，以及社会断裂所导致的“权利失衡”、“利益博弈”、“底线失守”、“信任危机”等各种后果，都成为孕育危机的温床。

当中国的转型社会嵌入全球化“风险社会”的背景，当今的中国如同置身于一个“风险胶囊”，各种矛盾丛生，危机极易爆发，并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公共危机发生领域呈现多元化；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并存；危机发生的频次、规模及危害性加强。

同时，当今是一个媒体逻辑的时代，媒体的报道塑造着人们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危机事件概莫能外，而且因为其往往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媒介报道对于人们如何看待该事件的影响更为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播成为对抗危机的基本任务，因为有效的沟通正是危机处理的关键要素。许多学者甚至认为传播是影响危机处理成败的关键，因此位居危机管理领域的极重要地位。^②

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虽然全球风险社会和转型社会的大背景给危机传播中的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媒体的实际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媒体的角色是根据社会需求构建的，中国媒体的最初角色定位是在 1942 年的延安时期，从当时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总体性社会为媒体提出的要求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但随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进入结构转型时期，整个大的社会系统由单一的政治权力控制的总体社会，向国家和社会逐渐分化的社会结构演变，公众和媒体逐渐成为一种相对国家政府独立的社会力量，旧的

^① 孙立平. 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② 吴宜蓁. 危机传播 [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9.

社会结构对于媒体的单一的喉舌期待和要求受到根本冲击,新的社会结构对媒体角色的期待不再是简单的喉舌角色来满足行政的需要,而需要媒体扮演更多的角色为公共利益服务。

概而言之,“全球风险社会”和中国社会转型为我们探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现实背景。中国在风险社会和转型社会的双重现实困境下,对本国的公共危机传播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媒体在危机传播中不仅要满足政府期待,也要满足社会公众的期待以及自我的期待,实现公共利益。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在行政束缚和经济诱惑下丧失了独立性,难以完成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现实和理想的距离,为在当代进一步研究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角色扮演提出了要求。

二、研究意义

1. 现实意义

在研究背景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面对的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期危机频发的现实,以及危机传播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都决定了中国社会需要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扮演合适的角色,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现实中却事与愿违,对于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实际扮演的角色,不仅公众诟病,政府困惑,甚至媒体自身都难以满意。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期待在公共危机发生后,通过媒体第一时间了解详尽的信息,并根据媒体提供的资讯应对危机,自我防护。但现实中,公众却时常发现在许多公共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主流媒体失语,公众只能通过小道消息、道听途说来妄自揣测;对于媒体来说,他们期待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恪尽职守,有所作为,却在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诱惑下难以监守自身的独立性;对于政府来说,他们一方面因为在公共危机中控制信息的披露,受到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一方面又担心在危机事件中完全放开媒体的报道,会招致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媒体因为没有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扮演恰当的角色,对一些危机的最终治理造成了拖延、反复的后果,伤害了政府、公众和媒体的核心利益,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直接伤害了公众的权益。

这一系列的现实困惑,迫切需要我们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在实际的角色扮演中遇到什么困境,困境来源于何处;通过什么路径让媒体能够从实际角色扮演的困惑中走出,扮演其应该扮演的角色。本书正是立足于中国所处的风险世界和社会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新闻媒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角色理论为视角,通过运用角色理论构建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应然角色,以及对近十年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角色作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回答



这三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厘清这三个问题，达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顺利化解危机，树立政府形象，扩大媒体的公信力，保障公众合法权益的现实目标，最终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减轻危机损害，维护社会良性发展和持久稳定。

2. 学术意义

第一，本书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对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多是基于个案的现象分析，止步于功能性的表层描述，缺少规律的探寻、性质的分析以及严谨的理论支撑。本书重视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创新和发展的具体情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学角色理论，提出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的演进性质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近性量变。并且，突破了以往媒介角色冲突研究中单一的个案研究取向，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探讨和总结了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冲突的具体规律。在此基础上，把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新闻媒介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研究，剖析其现存矛盾和困境产生的原因，为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扮演应有的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各学科的交叉、共振是目前社会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公共危机传播是一个跨门类研究的对象，它涉及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本书特别引入社会学的“角色分析”理论来分析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媒体角色，为公共危机传播中应然角色构建、角色演进的考察，以及角色困境的分析提供了理论资源，使得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体角色的研究不再是泛泛的现象梳理，而是具有理论支持，成为有源之水。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深入分析媒介在近十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演进和困惑，从战略发展的高度审视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独特价值，进而思考其未来的路径选择，对于危机丛生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公共危机传播的研究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学术话语中，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研究所关注的“危机”泛指各种“组织危机”(organizational crisis)，“组织”包括政府机构、企业、学校、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各种大小组织形态，这与西方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相适应。而作为“大政府、小社会”的本土语境，我国的组织危机一般

会上升到社会与国家层面,例如,三鹿奶粉危机,就不只是一个企业危机,而是事关各级政府的公共危机。

危机传播研究在中外学术界兴起的时间都比较短,在美国权威论文索引 Communication Abstract 上能够检索到的最早与危机传播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是分析在一场苏联与芬兰之间由外交冲突引发的危机中,报纸在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①这一危机事件发生在 1961 年,而相关的学术论文却发表于 1967 年。在此之后,也相继散见一些有关危机传播的研究,但都只呈现出局部的零碎的个案研究,没有为学术界所重视。直到 1982 年,美国发生强生公司“泰诺”胶囊遭下毒事件,这次成功的危机治理案例,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当年共出现了三十多篇以研究此案例为内容的危机传播论文,正式揭开了学界重视危机传播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国外的危机传播领域经历了“公关”、“语艺”、“批判”三种研究路径的流变。

必须指出的是,最初的公共危机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到危机传播的“移植”过程。危机管理是以管理学为核心的研究领域,而危机传播是将传播学作为核心,建立在新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基础上的交叉研究领域。对于危机传播最开始的研究大多数时候是由从事管理方面的研究者从管理的角度来进行,重点关注的是治理危机过程中传播的策略,后来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进入了该研究领域,使得危机传播成为传播学下的一门亚学科。危机传播是按具体研究内容为逻辑划分的传播学研究内容,类似的研究还有女性传播、健康传播等。^②

早期的危机传播研究采用的是线性的阶段研究模式,将危机视为有生命的个体,通过“诊断”每个生命时期的问题所在,做出相应的传播策略。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芬克(Fink)提出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将危机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善后期、解决期,这是以病理学的观点区分不同的分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危机处置重点。该理论比较全面地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循环往复的危机全过程^③。巴顿(Barton)提出了治理危机的五阶段,即“侦测、防范、抑制、恢复、学习”。^④澳大利亚公共政策专家阿索尔对危机发展的基本过程进行了描述,将危机发展和危机管理都分为了四个环节,即危机前的预

^① Pakarien E. News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A Study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Scandinavian Newspapers during the Russo-Finnish Note Crisis in the Autumn of 1961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Vol. 2, 1967, 224-228.

^② 吴予敏. 传播教育与人文理想[J]. 深圳大学学报, 1999(1).

^③ Fink S. 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M]. New York: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86.

^④ Barton L. Crisis in Organizations: Manag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Heart of Chaos [M]. Cincinnati, OH: South-Western, 1993.